

天津人民出版社



经济改革的 社会观



潘允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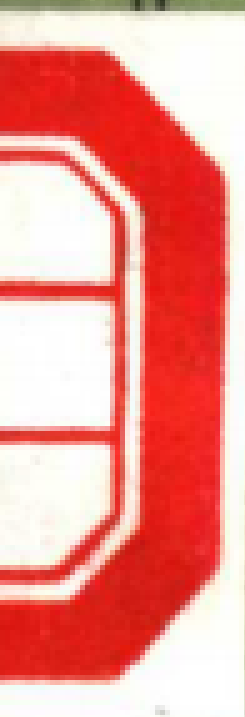
张文宏 著

责任编辑 / 余秀

装帧设计 / 王玲

JJGGDSHG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ISBN7—201—02235—0/F·223

定 价：6.80元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经济改革的社会观

潘允康 张文宏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序

《经济改革的社会观》一书,是“经济改革中的社会问题”课题的最终成果。该课题于1991年5月经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评审通过,被立为天津市“八·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潘允康、张文宏同志的《经济改革的社会观》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出发,以社会学家的敏锐目光捕捉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剖析。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的劳动积极性、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弱化、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职业妇女的两难抉择、血亲观念对改革的干扰、消费问题种种、企业人际关系、企业制度变革、企业文化、改革的社会心理、“企业办社会”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都反映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交叉和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

毋庸置疑,中国十几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即使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为之惊叹。然而,改革历程也不断地被新的冲突、矛盾和问题所困扰。由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而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改革进程的阻滞因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也再次证明了本书的一个基本议题:非经济因素或经济问题背后的社会问题对改革的成败具有重大意义。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集中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

问题,揭示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揭露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而带来的消极后果,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可行性对策。读罢全书,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看法:经济与社会改革的配套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我以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它是建立在社会调查资料基础上的,实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阐述与实际论证相渗透。该书的统计资料主要是通过天津市九大工商企业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和典型调查获得的。作者运用先进的 SPSS 社会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提高了数据的可信度和研究的科学性。二、注重历史资料的比较。该书虽然以 1990 年天津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但又不局限于此。作者广泛涉猎了国内其他学者八十年代进行的一些研究成果,并进行了比较,从而使研究更有系统,论证更有逻辑性。三、借鉴了国外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诸如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法国巴黎的未来研究世界联合会、瑞士的日内瓦社会远景世界协会等组织及美国的 T·帕森斯、日本的富永健一等专家的理论 and 观点。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读者会发现国外同类研究的精华。

总之,《经济改革的社会观》是我国公开出版的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经济改革中的社会问题的专著。它立足于改革实践的需要,着眼于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研究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也应该成为每一个社会学工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希望作者不断探索我国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社会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继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宏图大业做出贡献。

王 辉

1993 年 8 月 4 日

前 言

在中国,从1979年开始的那场改革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它使祖国母亲开始褪去了因动乱和衰败而显露出的憔悴和愁容,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容颜。中国开始走上强国富民之路,而且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中国的改革之路的艰难在于它不仅仅要解决经济发展和产值利润增长的问题,消除某些经济秩序混乱、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等弊端,还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牵联,使得情况十分复杂。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面临的新问题更多。探讨经济背后的社会问题,实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中国正面临着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共性问题和本身的个性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密不可分。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1)
第一节 向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均衡”的目标前进	(1)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挑战	(7)
第三节 社会学在研究和促进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13)
第四节 关于“我国经济深化改革中的社会问题研究”	(17)
第二章 人的劳动积极性	(21)
第一节 人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主体	(21)
第二节 改革中人的积极性分析	(23)
第三节 人的积极性的影响因素	(25)
第四节 人的积极性的调动	(31)
第三章 主人翁地位弱化	(37)
第一节 从职工渴望提高自己的地位谈起	(37)
第二节 主人翁地位弱化的事实	(40)
第三节 人不仅是劳动力而且是创造者	(47)
第四节 强化主人翁意识,提高主人翁地位	(50)
第五节 实行领导行为科学化的重要意义	(51)
第四章 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	(58)
第一节 职工文化技术素质的现状	(58)
第二节 职工的文化技术意识	(71)

第三节	提高职工文化技术素质的途径	(77)
第五章	职业选择的震荡	(80)
第一节	职业地位与声望对择业的影响	(80)
第二节	职业价值观的变迁	(87)
第三节	“双向选择”的利与弊	(94)
第六章	职业流动中的困惑	(101)
第一节	职业满意度及其制约因素	(102)
第二节	职业流动的原因与趋向	(109)
第三节	失业冲击波与第二职业现象	(120)
第四节	逐步走向合理的职业流动	(126)
第七章	女人的抉择	(131)
第一节	竞争中的弱者	(132)
第二节	家务和业务孰轻孰重?	(139)
第三节	只有回家的抉择吗?	(143)
第八章	血亲观念的干扰和亲属网络的人侵	(154)
第一节	家庭传统和中国社会	(154)
第二节	血亲观念的干扰	(157)
第三节	淡化血亲观念,优化改革环境	(170)
第九章	消费中的思考	(176)
第一节	消费——生产与社会生活的中间环节	(176)
第二节	消费大起大落透视	(177)
第三节	畸型消费种种	(185)
第十章	纵横交织的企业人际关系	(198)
第一节	研究企业人际关系的社会学意义	(198)
第二节	企业人际关系的现状	(200)
第三节	协调企业人际关系,提高企业凝聚力	(212)
第十一章	制度与制度改革	(215)
第一节	制度的社会功能	(215)

第二节	企业制度改革·····	(217)
第三节	破“一大三铁”与宏观经济制度变革·····	(226)
第四节	“劳动合同制”的试行·····	(233)
第十二章	企业改革的文化环境·····	(238)
第一节	企业文化“热”的缘起及社会意义·····	(239)
第二节	建构中国式的企业文化·····	(242)
第三节	企业文化建设中面临的新问题·····	(247)
第四节	优化企业文化环境·····	(250)
第十三章	企业改革的社会心理·····	(254)
第一节	改革与社会心理·····	(254)
第二节	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力评估·····	(259)
第三节	阻碍改革的消极心理·····	(264)
第四节	社会心理氛围的净化·····	(268)
第十四章	“企业办社会”面面观·····	(272)
第一节	形形色色的“企业办社会”现象·····	(272)
第二节	问题的成因和社会后果·····	(277)
第三节	现行保障制度的弊端及出路·····	(288)
第四节	住房制度改革的功能与困难·····	(293)
后 记	·····	(302)

第一章 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纵观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各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可发现它们无一不遇到过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不可分割,经济对社会问题的影响,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使得人们再也不能以单纯经济观点去分析和理解现代化了,而应把现代化与协调发展的概念联系起来。

第一节 向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均衡”的目标前进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均衡”是联合国在 1959 年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无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它的提出基于世界各国实行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相比而言,发达国家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而这一注意是从对于人的关注开始的。开始,人们对于发展的关注,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发展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的中心,是如何加快经济的增长,实现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目标,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同时则出现了忽视社会目标实现的问题。可是人们发现财富的急剧增长并未使人的幸福感成比例增长,反而是心理压力增大,人在财富的增长面前产生了新的困惑。人的积极性也没有在不断改善的物质生活中得到调动。于是人们相应地提出两个问题,其一,影响人的心理、情绪和积极性的不单是经济因素,还有其他因素(社会因素);其二,人的需求可能是多层次的,不单是物质利益和物质需求。对此,人们开展了各种专门性的研究。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领导的著名的霍桑实验,就是研究非经济因素影响经济行为的著名事例。1924年至1939年间霍桑实验者在芝加哥西部电气公司霍桑工厂对其雇员实行深入访谈和对劳动群体观察,并进行一系列现场实验。这个研究项目开始是由该公司的人事管理部门发起的,然后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美国工业社会学先驱者梅奥发生了联系,并由梅奥领导该项研究。该研究的成果和论据,被用于创立强调社会影响的工业行为理论,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人事管理理论的发展。虽然对于它的研究结果有过长期的争论,但它确实开创了从社会和组织角度研究人的积极性与工业发展的先端。

与此同时,对人们的多层次需求的研究也陆续开始了。他们的研究角度和出发点各不相同。

出生于波兰,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和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曾到西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非洲南部和东部,墨西哥瓦合加州等地从事社会实地调查,并依据调查资料和相关理论,提出人类需要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生物性的基本需要,如营养、生殖、安全等。人们并不是直接地和个别地在自然环境里得到这些基本需要的满足,他们要用工具,和别人合作;于是发生了第二类手段性的需要,如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等。生产技术须有知识的积累和传布,社会组织须有道德和宗教的维持,于是发生了第三类需要。^①

另外,其他一些学派,如弗洛伊德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等在对人的需求的研究上,也都超出了纯经济领域和物质需求范畴。

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以亚伯拉罕·马斯洛为首的一批心理

^① B. 马林诺斯基:《原始人的性生活》,1932,第36页,“第三版专序”。

学家从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形成了所谓心理学的“第三思潮”。马斯洛学派提出了人的需要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基本需要(因缺乏而产生的需要)。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如空气、水、食物、住所、睡眠、性生活等,还有安全与保障需要,爱与归属需要,自我尊重与他人尊重需要等。第二层次为发展需要(存在的价值或后需要),包括追求“真”、“善”、“美”、“活跃”、“个人风格”、“完善”、“必要”、“完成”、“正义”、“秩序”、“单纯”、“丰富”、“乐观诙谐”、“轻松”、“自我满足”、“有意义”等。第三层次为自我实现需要。根据马斯洛原理,就是人的第一层次基本需求中也并非纯物质的,亦包括精神等各个方面。第二层次、第三层次需要属于人的高层次需要。无论如何,人与社会的发展再也不能单纯归结为经济发展和物质需求之单方面,而是涉猎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广阔范畴。

以后,人们不仅从人的积极性和需求角度发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而且感到一些新的社会性障碍和社会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阻力。这些障碍和问题主要有:人口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口规模等),人的素质因素(包括人的教育水平、能力、动机),社会的制度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家庭、土地所有、宗教方面的制度)等。另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社会问题有些就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诸如污染、公害、犯罪问题等。因此,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都迫在眉睫。

从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已经出现了与此有关的一批有代表性的论著。1972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公开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极限》,至今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发行600多万册,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该报告持悲观主义观点,认为地球是个有限的系统,这种有限性决定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必然有一定限度;对增长的陶醉与崇拜势必导致世界体系的崩溃;技术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在有限系统中的无限增长问题,技术只能缓解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任何一个动态系统中都存在滞后现象,因此,绝不能等到滞后中内含的问题都充分显现之后再采取措施,否则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人类明智的选择是从过度增长转向全球均衡,即保持人口和经济的零增长以及两者的恰当比例。该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事实上这类全球问题广泛存在着,诸如“战争与和平”、“南北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粮食危机”等,远远超出经济发展的自身范畴。在罗马俱乐部后来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又进一步涉及到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方面,尽管它是不完善、不彻底的,但已广泛涉猎了经济、自然环境、人口、社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问题。

和罗马俱乐部“悲观派”观点相对的是以美国赫德森研究所为代表的“乐观派”观点的出现。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发表了《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这是从未来学角度研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关系的代表作。此后,美国的阿尔温·托夫勒和约翰·奈斯比特先后发表了《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都是从研究科学技术革命入手进而扩展到整个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的著名代表作,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另外,法国巴黎的未来研究世界联合会、瑞士的日内瓦社会远景世界协会等组织的专家、学者也都提出过类似观点,指出经济与社会问题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如大量的人口增长,现实和潜在的资源匮乏,难以控制的城市扩展,罪恶和毒品的泛滥,恐怖主义的流行,环境污染的恶化,道德价值的沦丧。经济与社会问题交织,还有科技问题,因此,难以对个别问题提出个别的解决办法,而要用系统的方法解决经济、社会 and 科技协调发展问题。

不仅美国、西欧如此,东方发达国家日本也已注意到这点。六十年代,日本在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之后,开始注意到企业发展与地区生活环境建设之间的不平衡现象。1963年日本初

次提出了针对完善人的素质和国民生活环境的“社会开发”概念。1967年日本国家经济计划改称为“经济社会开发”计划,前所未有地插入了“社会”一词。到了1970年,出于对公害议论的恐惧和限制公害影响的直接目的,日本又将“经济社会开发计划”加上了“以人性丰富的经济社会为目标”的副标题。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深刻地回顾了日本经济复兴的历史,指出日本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一直举行“以大资本主义为中心的生产至上主义,并非以国民生活为主题”。

福武直对此评价说:“社会开发在发达国家在重新组织社会方面表现强烈,然而在生产属一流、国民收入和消费属二流、住宅和生活环境属三流的日本,经济开发和社会开发的不平衡确已成为问题。”^① 1978年,担任日本总理大臣的大平正芳与新闻界知名人士田中洋之助有一次著名的对谈。大平正芳说:“至今我们不恰当地、过多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上,如果把这种状况称之为‘经济时代’,那么,是否应该从这样的时代向文化时代或者宗教时代过渡呢?”大平正芳的观点被田中洋之助称为“从重视经济价值向重视文化价值的方向发展”的历史观。^② 对于日本来说,“经济社会开发计划”不仅是更名而已,而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改变。

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们重视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进行综合研究的同时,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学者们也在广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比如在1978年前苏联出版的《社会学与社会发展问题》一书中指出:“有关社会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相互关

① 《现代日本社会》,第128页,福武直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复合力量的时代:大平正芳——田中洋之助对谈》第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系问题是当今社会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一点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思维的各种流派来说,都是正确的。”书中提出要“把社会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的传统指标一起,列入国民经济计划的体系中去。”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M·鲁特凯维奇在《计划工作要重视解决社会任务》一书中和著名社会学家奥西波夫在其所著的《苏联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均明确提出:“如果说过去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是考虑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制定的,那么现在就必须严格按照科学规定的社会目标来规划经济发展方向。”“如果说在第八个五年计划中,苏联的经济领导人为了有效地工作而不得不‘成为经济学家’,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最大限度地考虑经济核算、利润、赢利等范畴,那么在第九和第十个五年计划中,他们不能不经常关心和注意工人劳动活动的动机、工人对劳动满意或不满意等问题。我们还必须学会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协调起来的立场出发对待所有的经济任务。”^①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起初单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基础工业投资较大;因为资金短缺,大量引进外资,结果又造成债台高筑。他们追求增长第一,忽视协调发展,忽视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最后形成诸多的社会问题,反过来又使经济难以持续稳定地增长。现在他们也已开始意识到,协调发展迫在眉睫,对此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全球性的问题引起全球性的关注。联合国在1959年提出了均衡口号之后,于1970年开始推行第二个发展十年计划。1970年10月24日,在纪念联合国宪章生效25周年的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在大会的

^① 参见《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战略》何桂林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决议中写入了这样的内容：“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不正义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其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的。这就要求有一个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在工业与农业、贸易与财政、就业与教育、卫生与居住、科学与技术等领域中——采取以共同和集中行动为基础的全球性发展战略”。^① 各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社会发展的内涵也有不同。联合国将经济发展视为解决后进国家所面临的各種社会问题（贫困、恶劣的劳动条件，家庭及地域共同体解体等）的手段，并把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障碍过程称为社会发展，这些社会性障碍包括：（1）人口因素（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口规模等等）；（2）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土地所有、宗教方面的制度等）；（3）人的因素（能力与动机等）。^②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互为制约的。

总之，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世界许多国家都注意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努力向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均衡”的目标前进。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挑战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国不仅有一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还有一个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問題。

① 《联合国手册》第8版增编。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6页。

② 《经济社会学》[日]富永健一主编，孙日明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至 1979 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左”的思想干扰除去表现在“突出政治”、“搞阶级斗争”而忽视经济建设之外,还表现在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解放以后,我国基本上是效仿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国民经济发展以 5 年为一个规划周期,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虽然我们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建立了一个不发达但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出现盲目追求高速度,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与经济同步发展,科技、教育等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生态环境趋于恶化,人民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如 1953 年至 1980 年的 28 年中,我国社会总产品增长了 7.5 倍,国民收入增长了 4.1 倍,而居民消费水平却只提高 1.1 倍。1958 年提出“十五年内要赶上英国”,貌似战略性跃进,实则是历史性错误。^① 在文化革命十年动乱中,我国的经济濒于崩溃,社会发展扭曲,更谈不上协调二字。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全党工作重点开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但在经济发展上仍然在害“急性病”,对我国的国力,对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对各方面的“积重难返”估计不足,提出如“建设十来个大庆”等战略目标,不适当地重复引进一系列大型成套设备,一度出现“洋跃进”,继续忽视经济与科技、社会的协调发展,结果不得不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不仅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性的转移,而且开始了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初步认识。其主要标志是 1982 年 12 月 10 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更名,由原来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插入了“社会发展”的名称。这一变动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党

^① 参见《协调发展理论与天津的实践》第 32 页,大地出版社出版。